

湘雅医学院与西医入华的社会效应

向磊

(南京大学历史系,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近代中国新医学的传入与在华的基督教会密不可分。以湘雅之首创者胡美(Edward·Hicks·Hume)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医学, 不光培养了近代医学人才, 促进了当地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 更重要的帮助人们树立起了近代公共卫生意识和文明观念。体现中外合作精神的湘雅医学院对湖南, 对中国社会都有着重大的意义。西医入华的社会效应远远超过了医学本身, 扩大到了公共卫生、妇女解放及近代化等方面。

关键词: 西医入华; 中国新医学; 湘雅医学院; 基督教会事业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6-0719-07

近年来, 中外学界一直相当注意研究基督教会
在华事业, 在传教史、传教团体、著名传教士思想、
教会教育事业及反基督教运动方面都有大量著述。但是关于教会医学的研究多分散在通史、个人史及教会
大学校史中, 专题性的著述不如上述领域丰富。研究
多以一两座典型医学院和医院为例, 概括居多, 语焉
不详, 而且对于传教士的角色也存在诸多争议, 大多
数研究者仍定论在“文化侵略”的基调上, 但在一定
程度上客观指出了教会医学事业对造福中国的贡献。

建立于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是20世纪曾在西医
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所教会医学校, 其创始人
胡美博士(Edward·H·Hume)是20世纪影响突出的新教
传教士之一。但目前专题研究湘雅医学院的国内著作
不多见, 主要有湖南医科大学的校史《湘雅春秋八十
年》, 但涉及时段太广而粗, 叙述亦有失实偏颇之处。
论文有饶怀民的《从湘雅医学院的创办看教会大学的
作用》^[1], 但该论文的参照资料范围较狭窄, 仅限于
中文资料, 而没有相应的英文资料, 结论平平, 无甚
出奇。由于相关历史资料不够翔实精确, 对于湘雅
的认识目前也存在争议, 有人甚至从资金来源和福音
传播方式为论证, 质疑湘雅医学院是否是教会大学^[2]。
国外的相关资料有胡美的自传《道一风同》(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 An American Physician in China), 还有
霍尔登(Reuben Holden)所著Yale-in-China: The
Mainland, 1901~1951^[3], 另外, 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和《博医公报》(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中也有相关记载。

本文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胡美的经历和湘雅的成立
来说明西医传入中国的社会效应, 特别是对内地如湖
南省这样以往在人们印象中属于排外保守地区的影
响, 以湘雅这种地方政府和外国团体联合办学的模式
来说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中合作的重要性, 并通过分
析雅礼协会的性质、宗旨和胡美、颜福庆的经历来澄
清湘雅历史上的若干模糊问题, 即湘雅医学院的性质,
颜福庆在成立湘雅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胡美离华的原
因。根据所能见到的资料, 本文主要参考了1899年
~1933年的英文版《教务杂志》, 《博医公报》, 胡美
的自传《道一风同》(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
1905~1938年的《东方杂志》《医界春秋》《民国医学
杂志》《公共卫生月刊》等杂志。部分参考了《湘雅春
秋八十年》《长沙文史杂志》以及几位研究者的文章等
资料。

一、长沙城的风气转变与 传教士的进入

雅礼协会为何会选定长沙作为布道办学的地点? 其原因得归于20世纪初教会在湖南的传播和1905年长沙的新形势。

1905年时的长沙城, 已经经历过几场巨大的政治风波, 在长沙历史上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 但是

收稿日期: 2007-06-01;

作者简介: 向磊(1982-), 女, 湖南泸溪人, 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医疗史。

不寻常的是,在1901年的庚子之变后,中国的内陆省份也开始面临对外开放的命运,1903年10月湖南省政府与英国、日本签订《通商行船续约》,规定续约批准交换后的六个月内开放长沙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长沙游历、传教、经商和居住^[4]。长沙成为湖南继岳州^①之后第二个开放的口岸城市。

1901年八国联军登陆大沽口后,湘军在辽东半岛遭遇惨败和1903年岳麓书院的改制对于湖南士绅是沉重的打击,“吾湖南负罪于天下也”^{[5](7)},再没有维新前杨度那样意气风发的“试以中国为德意志,则我湖南当为普鲁士”^[6]的豪情。但是在长沙要开埠的情势下,士绅们仍然要坚决地捍卫长沙的纯洁性和传统。对于外国和外国人,湖南人深恶痛绝的抵制态度使得“守旧排外”成为湖南的著名标志。

湖南的教会势力不算特别强大,但历史还比较悠久,清初康熙年间,衡阳、湘潭两地开始有天主教的教堂,到1905年时,湖南的传教士共约1500人,发展教民约4万,建立孤儿院3所,学校12所^[7]。

总体说来教会在湖南南部地区发展比较顺利,教派组织和教堂也多集中在此,湖南北部教会势力较弱,尤其进入长沙城的过程颇费周折,这个城市的城门长期对他们充满戒备地紧闭着,高大的城墙和城中的士绅们坚决地阻断了他们的脚步。1897年6月的教务杂志转载了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上杨格非(Rev.G.John)的来信,题为《湖南的形势》,记述了他们去湖南衡州探访一个教团的经历,三过长沙城而不得入内,John一行人费尽周折,也未能走进长沙的城墙,他在城外观望了很久,他指出:“不管怎样,外国人应当要知道有这样一座珍宝的存在,而且,进入长沙的这一天也许有望总会到来。”^[8]

这一天随着长沙的开埠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城门的打开使外国人极为兴奋,“近年来最惊人的进步便是湖南这个中国最保守的省份,排外和反洋教最强烈的地方,现在向外国和教会活动开放了”^[9]。而当地人却深受震动,“租界二字划入湖南人之脑中者如压字机器之刻入纸背焉”^{[5](4)}。出于教训和形势的考虑,士绅们对传教已经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较之于利权被侵,传教的影响并无特别危害,“所谓传教者,虽有民教交阨之损失,尚无借此以掠要地,切取海权之事也”,他们开始劝导“民教相安”。但是他们捍卫正统的决心也未减弱,虽然不得不允许外人进入了长沙城,但是他们要使洋人在长沙城内无立足之地,1905年的长沙贴出一张以巡抚余廉三的名义发布的告示:政府不允许长沙城内任何居民将土地售予外国人,此类买卖绝对予以禁止^{[10](3)}。

就在这一年的6月,29岁的胡美医生,毕业于耶鲁大学和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受美国雅礼会派遣,带着妻儿从印度孟买来到这个人口为300000的长沙城,希望在这里创办起一所现代化的医科大学。雅礼协会(Yale-in-China)是一个不同于传统教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创立于1901年,主要组成人员为耶鲁大学校友会,彼此来自于不同的教派,他们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布道海外,传播福音,认为基督教的精神应该通过服务而不是传播教义来体现^②。负责人Harlan Beach写信劝说胡美赴长沙工作:“不久你便能在这里创办一所医科大学。”^{[11](19-21)}胡美因此而决定来到长沙。

二、雅礼医院的开办与草创时期

1906年11月胡美在长沙西门街的石牌楼的挂牌营业——“雅礼医院”。这是长沙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公共性诊所,同时在医院对面开办了“雅礼学堂”,首次招生共53人。大约两年后他逐渐发现其主要竞争者倒不是传统的中医大夫,这些大夫的出诊费用高昂,普通家庭无法承担得起,而是另外的人和物。在中国社会,人们的求医对象就不只是医生,还有神怪、佛寺和算命先生。对神灵菩萨等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甚至包括附会传说神化了的人、物和符号,例如,长沙城墙上放置的一门红衣大炮以其在太平军围城时发挥的威力而受到人们膜拜,尤其是家有病儿的母亲,纷纷认这座大炮为孩子的寄名父亲,借此希望大炮的神灵能够保佑孩子驱逐病魔。城市居民尚且如此,农村居民医疗条件就更加落后,胡美下乡去给妇女接生时,看见当地产婆接生时“不洗手,乌黑肮脏的指甲也不剪掉”^{[11](109)}。农村的白内障发病率极高,但大多数患者得不到治疗,到晚期几乎失明时则由乡村里的医生将眼皮缝合起来^{[11](81)}。而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的起步则是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卫生署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系统的卫生体系^[12]。而在近代史上,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天灾和人祸的发生频率一直居高不下,各种流行病的肆虐时间持久,范围也相当广泛。

而中国社会当时的实际医疗条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教会医院和传教士医生进入中国正好填补这一巨大差距。病人惊叹于西医开刀手术、针剂和麻醉术的神奇,既大大的减轻了病人的痛苦,也具有立竿见影的功效,愈合恢复也相当迅速。治愈病人即使最好的说明和广告,由高超的医术而建立起崇高的威望,这是西医能够立足的根本保证。

当然，民众对西医的接受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洋人的疑惧是西医诊所初开业时局面惨淡的主要原因。在长期的官方宣传及非官方的谣言等舆论影响下，“洋鬼子”是民众看见洋人的普遍反映，行医过程也充满了风险，如果有所失误造成病人死亡，就有可能激起千奇百怪的谣言，甚至导致暴乱。因此，首要的任务是建立起双方的信任，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渐次递进的过程。

而为了融入当地社会，胡美开始努力学习当地风俗，长沙的教会对他帮助良多，通过教会里的当地教徒给他解决了住所问题，并给他配备了当地人的老师教授中国话和礼仪，于是他入乡随俗的取了一个中文的姓氏“胡”，而且为了适应中国人的看病习惯，他也依照中医的方式，在诊治完成后还要开方抓药。他亦得遵从当地的规矩，给街道的清洁工、更夫等人缴税，甚至也要给盗贼团体交保护税，这样才能表现他也是当地居民之一，承担了共同的义务。初期条件艰苦，人手、医药和器械都缺乏，而且多为一些比较单一的切除、发热和传染的病例，工作量沉重繁琐，这些困难都得一一克服，而且不厌其烦的热心和服务也必将得到回报，能使自己得到人们真挚的信赖和友谊，这是无价之宝^[13]。

胡美在行医过程中也逐渐感受到了这种无价之宝的含义。他以麻醉术给病人切除脓肿，得到病人由衷地赞叹，并四处宣传洋医生医术的神奇。在接触的当地人渐次增多之后，他走上街头主动给兔唇患者提供手术，还给四乡八里闻名而来的白内障患者提供治疗，他逐渐发现普通的民众对待他的态度完全没有先入为主的仇恨和排斥，而在与当地人的交往过程中，他发现了中国人的聪敏、热情。胡美的医术和态度还是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和友谊，按照中国人酬谢医生的方式，他收到了许多锦旗，感谢他“妙手回春”^{[11](77)}。

作为医生的胡美得到了长沙的认可和尊敬，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认可逐渐也蔓延到城中的士绅阶层中。不断有商人、士绅和官员的家庭来请胡美出诊，并和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讲究人情关系网络的中国社会，这种关系对于日后湘雅医学院的建立有着极大的帮助。不过这种认可并不意味着西医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对长沙来说，胡美医生的西洋医术只是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是在中医治疗陷入绝境时的另一取舍。“我们钦佩您的医术，但我们对中医有着更大的自信。”^{[11](81)}

到了1910年以后，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已经初步打开局面，进入较稳定的发展期，教会医学界的主要课题从输入医生逐渐转到输入医术。如何使新医学的种

子在中国源远流长的生长起来？要培养中国的医学人才，建立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并且要在中国民众中传播公共卫生意识，而这一系列目的，都得从建立现代化的医科学校，培养出中国新医学的先行者开始。胡美怀有此愿已久，也一直希望能有一个是中国人的医生来帮助他，可以与长沙进行更好的沟通与联系。终于，在1910年参加汉口中国教会医学大会时，他见到了刚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颜福庆。

颜福庆(1882-1970)，字克卿，1882年7月28日出生于上海市。是一个美国的华裔移民家庭的后代，1906年，颜福庆被选送到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1910年，他接受美国雅礼会的聘请，到湖南长沙雅礼医院任外科医师^{[11](126-128)}。颜的到来在医学大会上引起骚动，中国人参加教会医学传播事业的时机成熟了吗？

事实上，其后颜福庆不光成为胡美的同事，也成为胡美的追随者。他在医院工作方面他擅长外科手术，尤其精于眼科手术，并且由于他的中国人身份，当地人对他更为放心和信赖。而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他深受胡美影响，成为20世纪30年代公医制的主要倡导者，并毕生为建立和发展中国人自己的医学卫生事业努力。这种中国人与外国人在医学事务上的合作继而为更广阔的合作搭起桥梁，颜福庆逐渐成为与长沙官绅阶层进行对话和沟通的主要人物，胡美期待着由此长沙的现代医学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三、湘雅医学院的创办

1908年前后，清廷的颓势已如江河日下。1911年，从湖北开始，中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912年新的中央政府成立。教会医学同时面临着发展和困境的双重前景。

国家力量开始介入公共事业，1915年，新的医学、制药和兽医考试标准颁布，这些条例所援引的原则完全是西方的标准^[14]。新的法令使西医拥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他们最大的困难便是资金不足。医院和医学院都面临着设备、人力的短缺。博医会在1912年发表报告，认为目前的中国医学教育物资相当缺乏，不能满足需要，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各个教会的合作。

但是压力也带来了新的契机，其中之一便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教会医学事业的援助。基金会成立了中国医学委员会(China Medical Board)，并在1915年起全面负责北京协和大学。此后，该基金会又对其他地

区的医学院进行资助,其中包括湘雅^[15]。

另外,教会医学界亦开始谋求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共同促进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雅礼协会与湖南的合作时机在此时逐渐成熟。

催生这一时机的力量来自于经胡美、颜福庆等人长期努力,与长沙社会建立起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包含三个层次:一是雅礼医院和雅礼学堂的共生模式;其次,雅礼医院与当地普通民众的来往交流;最后,雅礼医院与士绅阶层的沟通和互信。

雅礼协会甫一进入长沙进行布道事业之初,便有建立文理学院与医学院的规划。胡美秉承这一宗旨,从雅礼医院挂牌开业起便同时开办了雅礼学堂,学堂传授西医知识,医院进行临床示范,逐渐形成以医院带学校,以学校促医院的共生模式。这种共生模式在初期曾经面临巨大的风险,医院的信誉直接关系到学堂的命运,所以胡美在开业初期必须尽量避免出现死亡病例,否则学堂将被关闭;但是这种模式亦有着巨大的优越性,这种引入西方实验医学的教学方法得到学生的接受,而且医院的信誉和威望成为初期应对和消解学生罢课的有力因素。这一模式也被后来的湘雅医学院沿用。

雅礼医院在当地民众中建立的信誉和威望是支持医院发展和湘雅成立的巨大而稳定的社会资源。而士绅阶层则是促成医学院建立的主要力量。在胡美与士绅家庭的长期往来过程中,双方建立起友好,互信的关系。在政局变动时期,由于胡美是美国人的特殊身份和雅礼医院是教会医院的特殊地位,医院成为长沙政界要人和士绅们的隐秘集会地点。由此,雅礼医院逐渐参与到长沙的政治生活中,这一特殊关系对医学院的建立有着莫大的帮助。此时的长沙的士绅中出现了一批较开明,具有新学或西洋留学背景,倾向于西式制度和文明的新派,他们开始关注起公共卫生事业^{[11][160]},并愿意与胡美进行合作培养西医人才。在颜福庆加入雅礼医院后,颜成为双方进行沟通的主要斡旋人,促进了双方的互信程度。

直接促成湘雅建立的契机是一场瘟疫。1910年,由湘阴地区开始流传起一种传染病,范围直至湖南、湖北和四川地区,被称为“九江热”“宜昌热”等等,不一而足,颜福庆被湖北借去进行防治工作,胡美则在湖南开展大规模的疫苗注射。雅礼医院在这场瘟疫中的表现和作用使得其影响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得到了湖南都督谭延闿的赞赏,他因此而赞成推广西医传播,大力支持成立医学院。一切迹象表明,此时的中国和长沙正迫切的需要新科学和新知识,湘雅医学院应运而生。

但是建立过程并不一帆风顺,其间关系到地方与中央、雅礼教会与中国政府、中方人员与西方人员之间的复杂关系。湘雅的成立经过了长期反复的谈判过程。

1913年湖南政府决定与雅礼协会达成办医学院的协议,当地士绅提议,学校的名称应体现两方的合作,于是,取湖南之“湘”与Yale之“雅”,“湘雅”这个名字诞生,在当时的博医公报上,将其称为Hunan-Yale,后谐音为Hsiangya。但是,这一协议在初次上报北洋政府时却被驳回,认为由地方政府与外侨团体定约办学,无此先例^{[10](5)}。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14年春,颜福庆与胡美在北京四处奔走数星期之久,颜福庆联络到在京任职的35名军政要员,发起成立育群医学教育协会(Ru-Chun Medic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的运动,以育群医学教育协会的名义与雅礼协会联合办学,从而变成两个民间团体的协议。实际上,真正的协议双方仍是湖南政府与雅礼协会。为了表示教育权限属于中方,颜福庆担任了湘雅医学院的校长。经过这些改动,这一协议终于争取到议会的多数票赞成,得以通过。于是,1914年7月21日,双方根据1913年的草约,签订了十年的办学协议,协议内容如下:

(1) 在长沙维持一所医学校,其课程待经过仔细研究教育委员会章程之后方可确定,并要求该委员会委托几名督学检查所采用的标准;

(2) 维持一所医院,以治疗疾病,并建立一处或多处门诊治疗病人;

(3) 维持一所护士学校,授予学生以护理疾病的技术、学识,并在此基础上联系和维持产科的教学;

(4) 维持一所实验室,以便研究疾病发生原因^⑥。

此后,双方组成湘雅医学会,由育群协会和雅礼协会分别推举十名董事。中方有:朱延利,粟勘时,颜福庆,聂其琨,肖仲祁等人;雅礼会方有:胡美、解维廉(Hail William J.)、赫尔辉、盖耐保(Helen Gage)、茅爱理等^{[10](7)}。这些人员中,中方除颜福庆外皆为湖南士绅,美方皆为雅礼布道会之资深会员。这样的组合明白昭示了湘雅正是湖南地方政府与雅礼协会的合作产物。成立筹备从1913年开始,从新建校舍、医院到招生入学,一步步地开展起来,直至1919年,湘雅医学院含原西牌楼雅礼医院迁入长沙城外麻园岭新舍,其下所属学校、医院和男女护校统一冠以“湘雅”之名。

湘雅面向全国公开招生,而且秉承了协和医学院的教学方式,采用五年制和英语教学。开设的课程有医学预科课程,相关的生物学、物理学、化学以及临

床科学。胡美沿用了霍普金斯大学的教学方式，但又不同于当时北京协和医院的办学定位，协和培养的多是研究型的医学人才，在医学教育界有着提纲挈领式的地位，而湘雅的办学宗旨是要培养能下到实地，尤其是贫困和偏远地区工作的医生，注重实验和临床技能。但是解剖学的教授则经过了一番周折。1914年第一班时教授在远离街道得偏僻房间里给学生讲述解剖原理，并远赴上海进行实验，第二年亦是如此^{[11](179-180)}。

四、新医学与新风气

随着医院影响力和范围的增大，受到文明新风影响的年轻人逐渐受到西医的吸引，成为开办医学院的主要生源，这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女性。她们打破传统妇女不得随便抛头露面，接近陌生男子的禁忌，投身加入护理行业。1911年11月，在Miss Nina Gage的帮助下，长沙的护理班成立，既招收男生，也招收女生。“护士”这个词开始在长沙人的视野中出现，胡美在出诊过程中向当地家庭推荐这种经过专业培训的护理人员，她们的专业知识有利于病人得到适当的照顾，对于治疗有很大帮助。

到了1920年时，学生已经增加到42名，该年春天，第一届学生共11人毕业。这些学生来自湖南、湖北、浙江、安徽、广东、江苏、江西、福建等地，大多家境比较普通。胡美提到有个来自澧陵的谭姓学生，之所以投考湘雅就是因为曾经在萍乡见到颜福庆等人在调查瘟疫的情景，引起他莫大的兴趣，从而决定学习西医科学^{[11](180)}。

医院也开始改变民众的观念。人体解剖在传统社会视为异端和邪恶之举，重死和对尸体的敬畏观是主要原因。西医的困境在于只能从死刑犯这条途径得到供解剖的尸体，而且解剖与长期以来关于洋教的种种谣言如“破腹剜心”等不谋而合，令不了解的民众感到恐惧。因而湘雅在这点上十分小心翼翼。从男女同校到教授解剖，这些挑战传统中国禁忌的措施是输入现代医学的必要条件，并逐渐得到长沙人的理解和支持。对此，在胡氏的自传中有如下记载：

预科学校的一个看门人，有一日来见我，建议道：“胡美医生，你经常说我们应当精于检查人体来发现为什么会生病。如果你能检查一下我的孩子的尸体，我将感激不尽。如果我们对他的病了解得多一些，也许就可以救活别的孩子。”

尽管我们未能在这孩子活着时确认他的病情，我

们发现他的肝脏遭到严重的寄生虫感染。我们关于热病的知识那天得到了极大的丰富^{[11](181-182)}。

20世纪20、30年代，湘雅的影响逐渐超出单纯的医学领域，颜福庆认为由医学领域合作开始，中外双方有望继续开展进一步更深广的合作^[16]。胡美开始呼吁长沙人改善这个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首先亟待改善的便是长沙的地下排水系统。由于排水不畅而引起的水污染是致命的传染病源。这项浩大的工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工，而且当时省政府的财政状况也无力支持这种改造，但是这一呼吁在长沙人心中唤起了警醒，甚至得到一批旧式妇女的支持，她们为此发起募捐，四处奔走。女性的积极和勇气很让胡美惊叹，伴随着这批旧式女性的新意识而来的，还有踏着解放脚和天足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女性，她们成为活跃在新式学校，政治活动中的突出人物。

湘雅医学院在抗战和内战时期，也成为伤兵救济的重要基地。湘雅与华中万国红十字会之间具有合作关系，湘雅为红十字会提供义务伤员治疗服务，在湖南沅陵，常德等地设立医疗所，红十字会提供一定的药品和物资。1941年的一封信中，红十字会注明药品及物资运往沅陵的湘雅医学院^⑤。

但是新风气所及之处到底有多远，有多深？当时中国的医药卫生状况仍然相当严峻，肺结核、呼吸道疾病、心脏病和肾病是当时死亡率最高的几大疾病，天花、白喉、麻疹等流行性传染病长期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中国社会亟待医学知识普及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但是胡美尽十七年之力也未能使现代医学在长沙人的意识中得到普及和信服。他发现，在这个泛神信仰的社会，他所不能改变的仍然是民众根深蒂固的习惯和信仰。这些仍在延续的行为有：叫魂仪式、寺庙祈福，还有每年一度前往南岳衡山进香的佛教徒长队，人们的因果报应意识……等等，让他觉得任重道远，如果中国人对未知的神灵有如此深厚的信仰，那么现代医学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他们所接受？他不得而知。

“五四”运动之后，一场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发端并逐渐扩大，作为Hunan-Yale合作方式的湘雅医学院的在这次风潮后不久即被迫停办。1926年，湘雅学生如当时全国各地的学生一样，举行罢课，组织反帝游行，风波平息后不久，谭延闿告知胡美：“我们感激你们外国人为帮助中国而所作的努力，但是我们不能再忍受帝国主义了。”

胡美答道：“这正是大势所趋，董事会里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人员皆愿意顺应这一潮流。”^{[11](701-704)} 1926年夏，胡美及所有外籍教师在省政府派出的一

百名士兵保护下,登上去武汉的拥挤火车,继而回国。对于他们的离去长沙报纸的评论如下:

长沙的教育界应胡美医生之请,允其辞职,其工作交给中国管理人员继续执行,渠等今日已完全能够胜任^{[10](21)}。

是否的确如此?1931年胡美再次来华,他视察了湘雅医学院、医院及护理学校,很欣慰的发现湘雅这一体系在中国人的负责下,有条不紊地运行着,并显示出蓬勃的活力,向中国各地输送新医学人才。之后,他写下:It was a good harvest.(这是好的收获)。实际上,自胡美等离开长沙后,1927年,颜福庆因与外国人、北京政府和颜惠庆^⑤关系过于密切,也离开湘雅去了武汉,而后一度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职,后又在上海参与创办第四中山医学院^⑥。第一批的其他教师亦纷纷离开。湘雅命途多舛,1927年停办,1928年复校,大学部并入华中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流亡贵州、重庆,1945年复校。要说收获,当不在于湘雅本身。而在于湘雅培养的医学人才确在中国各地成为传播现代医学的先锋以及一批又一批的后继者。

从1921到1949年6月,湘雅共培养毕业生351人。而1936年起卫生署开始在全国建立卫生体系,公共卫生观念终于被纳入施政纲领,同时期医学界发出要建立吾国之新医学的呼声,颜福庆指出“我们若是能够很早的实现合于我们中国人之现代医学,我们就能很快的洗刷掉现代中国医学是‘外国’医学的污点。”^[17]至此,中国人自己在新医学领域担任起启蒙、推广和改进的任务,传教士所承担的西医入华之传递角色告一段落。

五、结语

所谓西医入华,实为新医学之入华,与近代新科学与思潮之入华历程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的接受方式由被动转为主动,并对此进行了中国式的消化。就新科学本身来说,它的传播有赖于东西方的合作,医学也是如此,因此以传播医学为宗旨的雅礼协会^⑦与学习医学为目的的长沙进行合作而诞生的湘雅医学院,其所体现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传播了西方医学,更重要的是培育了自主承担传播和推进新医学的中国医学界人才。正是这样的人才,如湘雅的第一届毕业生张孝骞,在日本侵华,湘雅几乎面临消亡的时刻担任校长,承担起继续维持湘雅的任务^{[10](29)};也是这批人才在湘雅流亡西南的过程中坚持教学,保存了湘雅薪火相传的种子。

这一点,不光惠及湘雅医学院,也惠及了中国社会。湘雅创始人颜福庆的预防医学和公医制思想在近代影响深远,他本人及一批湘雅校友如乐文照、汤飞凡、高镜朗等人追随胡美的宗旨,在上海、重庆等地继续创办湘雅式的新式医科学校。

在胡美提出建设长沙的城市排水系统后15年,这一设想得以实现,当然,实现的不仅仅是现代化的排水系统,中国大众关于营养、卫生的观念都有了长足的长进,同时,红衣大炮、南岳进香和叫魂仪式在长沙社会里渐渐淡出。

从湘雅这类医科学校的影响可以看出,以医院为发端,以医科学校为延伸,教会医学事业将新医学的影响范围从治疗疾病扩大到了公共卫生,国民素质,妇女解放乃至近代化。

注释:

- ① 1899年11月13日,岳州正式辟为商埠,设海关于城陵矶,英人哈得斯充任海关税务司。参见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44-48.
- ② Yale-China's earliest roots lay in the religious fervor sweeping American college campuses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organization was founded in 1901 as the Yale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by a group of Yale graduates and faculty members committed to establishing a Christian missionary presence overseas. The founders chose China as the focus of their work, in part to honor the memory of a Yale graduate from the class of 1892, Horace Tracy Pitkin, who had worked in China as a missionary and been killed in 1900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The city of Changsha in Hunan Province was chosen as the base of operations in China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other foreign missionaries.参见 Nancy E. Chapman, Jessica C. Plumb. The Yale-China Association: A Centennial History[M], published by Yale-China Office.
- ③ 译自 A Report of Hunan-Yale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Hospital, Changsha, Hunan[J].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21, (7): 114-122.
- ④ 华中万国红十字文件,1941-1945.湖南省档案馆,全宗号67,目录号2,案卷号244.
- ⑤ 颜福庆之兄,1914-1915年先后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长,内阁总理。参见颜惠庆遥控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J].民国春秋,1997,(05):41.
- ⑥ 即后来的上海医科大学,今属复旦大学医学院。参见刘笑春,李俊杰.湘雅春秋八十年[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21.
- ⑦ 雅礼会所涉及的不限于医学,包括中、高等教育和女子教育等,此处专指其创立湘雅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饶怀民. 从湘雅医学院的创办看教会大学的作用[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6, (12): 98-103.
- [2] 彭平一. 湘雅医学院是教会大学吗[J]. 高等教育研究, 2002, (11): 94-98.
- [3] Reuben Holden. Yale-in-China: The Mainland, 1901- 1951[M]. NewHaven, 1964. 参见聂资鲁. 百余年来美国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J]. 近代史研究, 2000, (3): 255-296.
- [4]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9: 15.
- [5] 三户愤民(杨毓麟). 新湖南[M]. 清光绪 29 年.
- [6] 杨度. 杨度集[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95.
- [7] 周秋光. 传教士入湘和湖南人民的反教派外[J]. 湖南党史, 1994, (2): 55.
- [8] Rev.G.John. The Situation in Hunan[J]. The Chinese Recorder, 1897, (6): 251-265.
- [9] Editorial. The Opening of Hunan[J].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05, (2): 87-88.
- [10] 刘笑春, 李俊杰. 湘雅春秋八十年[M]. 长沙: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4: 3.
- [11] Edward H. Hume, 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M].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Ltd.
- [12] 卫生署. 公共卫生月刊[J]. 民国二十五年出版, 第一卷 1-8 期.
- [13] Elliott C C. Surgical hints to young medical missionaries[J].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12, (6): 144-149.
- [14] 王吉民, 伍连德. 中国医学史[M]. 520-618, 转引自(美) Jessie G. Lutz, 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1950 年[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117.
- [15] Roger S. Greene, the work of the China medical board, rockefeller foundation[J].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17, (5): 325-328.
- [16] Yen F C. The Hunan-Yale medical college as a co-operative institution with the chinese[J].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5, (11): 701-704.
- [17] Yen F C. Medical eucation in China: Past and present[J].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35, (5): 345-362.

Xiangya Medical College and the social influence exert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XIANG Lei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edicine be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 is tightly associated with missionary practice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how the foreign priests affect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by promoting western medicine knowledge,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Edward-H-Hume, the founder of Xiangya Medical School. They contributed to China with not only the cultiv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but also the consciousness of public sanitation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one: the Change of Ethos in Changsha and the Entrance of Missionary, focuses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1905, and makes a review of the missionary in Hunan. The second one: the Practice of Yali Hospital, analyzes the reason why the western medicine is popularly accepted,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Hume. The la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Yale-in-China and Hunan Government Found Xiangya Medical School in Cooperation is a history of Xiangya Medical School, which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ooperation.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Xiangya Medical School is a model of cooperation, which means a lot to Hunan and China.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effected beyond medicine only, it exerts great influence over the public sanitation, women's liber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Chinese new medicine; Hsiangya medical college; christian enterprises

[编辑: 汪晓]